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8 卷第 2 期 (3/2023)，頁 1-56

憲法訴訟法施行後之 違憲審查論理

廖義男*

摘要

施行 73 年之久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總共作成 813 號司法院解釋，對憲政民主法治之發展及人權維護，影響深遠並有相當之貢獻。2022 年 1 月 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改制為「憲法法庭」，回歸司法權之行使，本質上應為審判之作用。因而將原來大法官釋憲之程序朝向「法庭化」及「訴訟化」修正，其審理所為之決定均以憲法法庭之名義作成裁判之形式加以宣示，展開「憲法法庭裁判」之時代。

*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前司法院大法官；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

編按：2022 年 10 月 20 日本院舉行「法學院二十週年院慶學術研討會」——《干預行政法制學術研討會》，廖義男教授慨允於本院就最新作成之憲法法庭判決進行專題演講，可容納近 200 人之本院演講廳座無虛席，更吸引許多實務專家學者前往聆聽，引起聽者廣大迴響，該會議論文經廖教授同意及校訂後，收錄於本刊，以饗讀者，謹在此向廖教授致上最高崇高敬意與謝意。

接受刊登日期：12/27/2022

責任校對：葉蕙禎、容珮瑜

本文先說明釋憲制度之產生及變革，梳理憲法訴訟法之特色與修法重點，再以憲法訴訟法施行後迄今（2022年9月30日）為止之9個月期間，所作成之15件憲法法庭判決為研究對象，除觀察新法對於憲法法庭作成裁判之效率及品質之作用及效果，並分析其在違憲審查之論理及判斷上，有無新價值、新觀念、新理論或新方法之提出，以及是否均有嚴謹之論證或邏輯推理及充足之理由，支持其判決主文之結論而足以令人信服。本文選擇其中有總額1／3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之4件判決，以及認為其判決之論理及判斷實有待商榷之另2件判決，予以分析檢討，深切期望維護人權最後一道防線之憲法法庭，其判決能更見周全，並為健全法治及保障人權，做出更大之貢獻。

The Logic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Yih-Nan Liaw**

Abstract

For 73 years, the "Council of Grand Justices" has been in effect, resulting in 813 Interpretations that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On January 4, 2022,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came into effect, restructuring the system in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returning the exercise of judicial power back to its essential adjudicative role. Therefore, the original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by the Grand Justices has been revised to become more "judicial" and "litigious" in nature. The decisions made during the trial are declared in the form of judgments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ushering in an era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s."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utl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and its key amendments, and then uses the 15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s made in the nine month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until September 30, 202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addition to observ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ormer Justice, Constitutional Court, R.O.C. (Taiwan); Dr. jur., Tübingen University, Germany.

of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s under the new 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whether there are any new values, concepts, theories, or methods proposed in the reasoning and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in its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as well as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logical reasoning or evidence to support its judgment and conclusio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four judgments where one-third of the Grand Justices expressed dissenting opinions and two other judgments where the reasoning and judgment were subject to debate, with the hope of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for human rights, and making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憲法訴訟法施行後之 違憲審查論理

廖義男

目錄

壹、前言－「憲法法庭裁判」時代之來臨

貳、釋憲制度之產生及變革

一、釋憲制度之產生及作用

二、從大法官會議到憲法法庭

三、憲法訴訟法之特色

參、憲法法庭判決之統計分析

一、憲法訴訟法施行迄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為止作成之判決

二、案件類型之統計分析

肆、憲法法庭判決違憲審查之論理評析

一、爭議性較大案件違憲審查之論理評析

二、其他判決之違憲審查論理有商榷餘地而應予評析者

伍、結語

關鍵字：憲法訴訟法、憲法法庭、違憲審查、健保資料庫、農田水利會、原住民身分

Keywords: 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 Constitutional Court, Constitutional Review,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Research Database, Irrigation Association, Status of Indigenous People

壹、前言－「憲法法庭裁判」時代之來臨

法律係社會生活之規範，經濟與科技之發展、社會生活形態之轉變，以及人權價值及法治思維之更新，常促成法律之修正或制定新法以資因應。法律人對此法律之變革，自應時時加以注意。

2022 年 1 月 4 日施行之「憲法訴訟法」，將施行 73 年之久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改制為「憲法法庭」，回歸司法權之行使，本質上應為審判之作用。因而將原來大法官釋憲之程序朝向「法庭化」及「訴訟化」修正，其審理所為之決定均以憲法法庭之名義作成裁判之形式加以宣示，因而展開「憲法法庭裁判」之時代。而在此新制度之變革下，釋憲實務及理論如何發展，以及其對法治發展之影響，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因此，本文即以憲法訴訟法施行後迄今（2022 年 9 月 30 日）為止之 9 個月期間所作成之憲法法庭判決為研究對象¹，觀察其在違憲審查之論理及判斷上，有無新價值、新觀念、新理論或新方法之提出，以及是否均有嚴謹之論證或邏輯推理及充足之理由支持其判決主文之結論而足以令人信服。

貳、釋憲制度之產生及變革

一、釋憲制度之產生及作用

法律之修正及新制定，基於民主原則，應由人民選舉產生之民意代表組成之國會，以嚴謹審慎之立法程序審議通過，並經總

¹ 本文為於 2022 年 10 月 20 日舉行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二十週年院慶學術研討會之演講稿，因此，所討論之憲法法庭判決以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為止所作成者為範圍。

統公布始能施行。因而經此程序通過之法律有其民意基礎而具有民主正當性，並得以有規範及拘束人民之效力。惟本於立憲精神，奉行憲法為最高法規範之位階及效力，以及基於權力分立及制衡原則，國會所通過制定之法律雖有其民主正當性，但如有違背或不符合憲法意旨或精神或憲法規定之原則者，例如：平等原則（憲法第 7 條）、比例原則（憲法第 23 條）、正當法律程序（憲法第 8 條）；或牴觸或侵害憲法所保障基本人權（憲法第 7 條至第 22 條）之核心價值及基此衍生形成之憲法秩序或制度者，則由職掌司法權之機關宣告其違憲，使該違憲之法律規範失其效力或定期失效或停止適用，以維護憲政秩序及確保其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並維護憲法為最高法規範之效力及尊嚴。

二、從大法官會議到憲法法庭

憲法第 78 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第 79 條第 2 項並規定此項職掌由司法院大法官行使之。在 2022 年 1 月 4 日施行「憲法訴訟法」前，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包括「省自治法」有無違憲（憲法第 114 條）、「省法規」有無牴觸國家法律（憲法第 117 條）；以及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審查（憲法第 171、172、174 條），係以「大法官會議」之方式作成「司法院解釋」，自 1949 年 1 月 6 日作成第 1 號解釋至 2021 年 12 月 24 日作成第 813 號解釋為止，73 年間總共作成 813 號解釋²。從早期

²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歷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規則」（1948 年 8 月至 1958 年 7 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1958 年 7 月至 1993 年 2 月）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1993 年 2 月至 2021 年 12 月）三個時期。其所作成之司法院解釋，仍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並不因憲法訴訟法之施行而受影響。

解答憲法及法律規定之疑義及憲法機關權限之爭議，到後期積極維護人民基本之自由或權利，闡明人權價值理念及其確保之方法，確立法治原則，對憲政民主法治之發展及人權維護影響深遠並有相當之貢獻。

三、憲法訴訟法之特色

（一）審理標的增加，包括「裁判憲法審查」

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除沿襲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既有制度之「法規審查」³、「機關權限爭議」⁴、「適用憲法發生疑義」⁵、「統一解釋法令」⁶、「政黨違憲案

³ 「關於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關於省自治法、縣自治法、省法規及縣規章有無牴觸憲法之事項」，為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大審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又「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後段、第2款、第3款）。另「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大審法第5條第2項）。

⁴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法之爭議，得聲請解釋憲法（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

⁵ 「關於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事項」，為大法官解釋憲法之事項（大審法第4條第1項第1款）。又「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得聲請解釋憲法（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

⁶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其職權上適用法律或命令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其他機關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但該機關依法應受本機關或其他機關見解之拘束，或得變更其見解者，不在此限。」或「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權利遭受不法侵害，認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

件」⁷、「總統、副總統彈劾案」⁸外（憲訴法第1條）⁹，並新增「裁判憲法審查」（憲訴法第1條第1項第1款、第59條）¹⁰。

按原來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僅人民「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釋憲，即大法官只進行「抽象法規範」審查。雖實務上將實質上本為個案裁判中表示之法律上見解被列為「判例」而具有法的規範效力、以及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決議或最高行政法院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議，因具有事實上拘束力，而認為「相當於命令」，可作為大法官解釋之客體（司法院釋字第154號解釋理由書、釋字第374號解釋理由書、釋字第420號解釋參照）；並許聲請人得以確定終局裁判所引用之「判例」或「決議」之見解，被大法官解釋宣告為「與憲法意旨不符」者為其得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司法院釋字第185號、第725號解釋）。但

或命令所表示之見解，與其他審判機關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有異者。但得依法定程序聲明不服，或後裁判已變更前裁判之見解者，不在此限。」得聲請統一解釋（大審法第7條）。

⁷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主管機關得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解散之。」（大審法第19條第1項）

⁸ 「立法院提出總統、副總統彈劾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時，被彈劾人應即解職。」（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10項）

⁹ 憲訴法第1條：「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一、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二、機關爭議案件。三、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五、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六、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司法院解釋者，其聲請程序應依其性質，分別適用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規定。」

¹⁰ 憲訴法第59條規定：「（第1項）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第2項）前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基本上，認為仍屬「抽象法規範」審查，並非對「具體個案判決」之審查。而憲法訴訟法新增之「裁判憲法審查」則明白引進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將原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法規範」及「該確定終局裁判」二者，納入人民得聲請憲法審查之客體，俱屬憲法法庭所得審理之案件類型。又為避免因此湧進大量不具憲法重要性或非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之案件，影響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效能，進而排擠其他具憲法重要性之案件，遂於憲法訴訟法第 61 條第 1 項規定：「本節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受理之。」予以限制。再者，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憲法法庭認人民之聲請有理由者，應於判決主文宣告該確定終局裁判違憲，並廢棄之，發回管轄法院；如認該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違憲，並為法規範違憲之宣告（憲訴法第 62 條第 1 項）。亦即直接廢棄該確定終局裁判，使管轄法院再為審理，而不須循原來制度，要求人民借助再審或非常上訴等制度尋求救濟，以落實較完整之救濟功能。

（二）規定迴避與進行言詞辯論

釋憲制度既然「法庭化」及「訴訟化」，因此為確保法院審理及判決之公正、客觀而應有之「法官迴避」及「判決原則上應本於公開言詞辯論」之原則等，憲訴法均有明確規定¹¹。惟須一提者，「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及「政黨違憲解散案件」之判決，固然應本於言詞辯論為之，但其他案件，如「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機關爭議案件」、「地方自治保障案件」、「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等，其判決則得

¹¹ 「法官迴避」包括「自行迴避」與「聲請迴避」，規定於憲訴法第 9 條、第 10 條；「言詞辯論」規定於憲訴法第 24 條至第 29 條。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憲訴法第25條第2項）。其立法理由為「案件事理繁簡有別，並考量憲法法庭之唯一性，宜由大法官就個案需要決定是否行言詞辯論」。

（三）調整「案件可決人數比例」

依大審法第14條規定：「（第1項）大法官解釋憲法，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人三分之二同意，方得通過。但宣告命令牴觸憲法時，以出席人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2項）大法官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方得通過。」而憲訴法則依案件類型之不同，就其可決人數比例作不同之規定。即：

1.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機關爭議案件」及「地方自治保障案件」依一般規定，即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憲訴法第30條）。裁定，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參與評議，參與大法官過半數同意（憲訴法第31條）。

2.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政黨違憲解散案件」則適用特別規定，即宣告彈劾成立之判決及宣告政黨解散之判決，其評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憲訴法第75、80條）。

3.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亦別有規定，即其受理及其評決，應有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參與評議，參與評議大法官過半數同意。未達同意受理人數者，應裁定不受理（憲訴法第87條）。

此項調整「案件可決人數比例」，有重大意義。申言之，依新法要作成法律違憲之判決，只要有10位以上大法官參與評議及8位大法官同意即可成立。不須如舊法時代，縱有9位大法官之多數認為法律違憲，但有6位大法官之少數認為法律並不違憲者，仍不能作成法律違憲之解釋，而形成少數意見否決多數意見之不合理結果。

（四）採取「主筆顯名制」

憲訴法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判決書應記載參與判決之大法官姓名及其同意與不同意主文之意見，並標示主筆大法官。」即「主筆顯名制」為其特色。依其立法理由之說明，係參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設計，期使日後憲法法庭裁判理由之論述，可以避免不需要的妥協，較能維持論述的邏輯一貫與完整性，復能有助於憲法法庭作成裁判之效率。

（五）以「審查庭一致決」處理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合法而裁定不予受理之案件

憲訴法第 32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案件之受理，除本法別有規定外，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參與大法官過半數同意；未達同意人數者，應裁定不予受理。」又聲請不合法或顯無理由者，憲法法庭應裁定不予受理（憲訴法第 32 條第 1 項）。

但聲請憲法法庭裁判，而聲請人無當事人能力、聲請逾越法定期限、或就不得聲請或不得更行聲請之事項為聲請、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等，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予受理（憲訴法第 15 條第 2 項）。「審查庭」係由大法官三人組成（憲訴法第 3 條第 1 項）。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審查庭以案件並不具憲法重要性，或並非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得以一致決為不予受理之裁定，並應附理由；不能達成一致決之不予受理者，則由憲法法庭評決受理與否。又審查庭一致決裁定不予受理作成後十五日內，有大法官三人以上認應受理者，由憲法法庭評決受理與否；未達三人者，審查庭應速將裁定公告並送達聲請人（憲訴法第 61 條）。

此項以「審查庭一致決」處理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合法而裁定不予受理之案件，係簡化憲法法庭處理依法不應受理之案件，避免因此等應不予受理案件之處理，消耗憲法法庭審理案件太多時間。

（六）明定「裁判之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效力，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及其前身「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皆未有規定，而係由大法官在自己作成之司法院解釋加以闡明。亦即在司法院釋字第 177 號解釋首先指出：「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繼而在釋字第 185 號解釋闡明：「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為憲法第七十八條所明定，其所為之解釋，自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應依解釋意旨為之，違背解釋之判例，當然失其效力。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或其適用法律、命令所表示之見解，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與憲法意旨不符，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再審或非常上訴之理由……。」此種以自己作成之解釋「創設」或「說明」自己解釋效力之方式，畢竟欠缺法律之明文。因此，憲法訴訟法即就此有所明定。即第 38 條規定：「（第 1 項）判決，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各機關並有實現判決內容之義務。（第 2 項）前項規定，於憲法法庭所為之實體裁定準用之。」第 39 條：「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並應以裁定宣告判決效力及於其他以同一法規範或爭議聲請而未及併案審理之案件（憲訴法第 40 條）。以及第 88 條：「憲法法庭判決就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與原因案件確定終局裁判有異時，聲請人得依法定程序或判決意旨請求救濟。原因案件為刑事確定裁判者，檢察總長亦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第 89 條：「（第 1 項）憲法法庭就法規範見解所為之統一解釋判決，各法院應依判決意旨為裁判。（第 2 項）前項判決不影響各法院已確定裁判之效力。」

上述新法修正之特色與重點¹²，對於憲法法庭作成裁判之運作，自有深遠之影響，而其對憲法法庭作成裁判之效率及品質發生之作用及效果如何，更是值得觀察。而作此項觀察，則應從憲法訴訟法施行後，憲法法庭所作成之判決著手，並就其在判決中所作違憲審查之論理，予以分析並加以評價。

參、憲法法庭判決之統計分析

一、憲法訴訟法施行迄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為止作成之判決

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之憲法法庭網站（<https://cons.judicial.gov.tw>），對於憲法法庭作成之判決及其相關資料，包括判決書、協同意見書及不同意見書、解釋憲法聲請書、原因案件之裁判書、相關之法規及解釋等均有公布。依此官方公布之資料，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¹³，憲法法庭共作成 15 號判決¹⁴，即：

1.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肇事駕駛人受強制抽血檢測酒精濃度案）
2.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強制道歉案〈二〉）
3.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被告之辯護人對羈押裁定抗告案）

¹² 關於憲法訴訟法新制內容之介紹及評析，可參考許辰舟（2021），〈憲法訴訟法簡介及相關問題淺析〉，《司法周刊》，2084 期司法文選別冊，頁 1-32；李建良（2022），〈行政法院審判與裁判憲法審判〉，《月旦法學雜誌》，322 期，頁 6-31；林鈺雄（2022），〈裁判憲法訴訟新制〉，《月旦法學雜誌》，322 期，頁 32-52；吳信華（2022），〈「憲法訴訟法」的幾個立法缺失〉，《月旦法學雜誌》，322 期，頁 53-70。

¹³ <https://cons.judicial.gov.tw/judcurrentNew1.aspx?fid=38>（最後瀏覽日：10/09/2022）。

¹⁴ 憲法法庭作成之憲判字第 1 號至第 15 號判決，並載於司法院公報第 64 卷第 3 期至第 8 期（2020 年 3 月至 8 月）。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作成於 2022 年 8 月 12 日。

4.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
5.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5 號判決（營利事業所得跨年度盈虧互抵案）
6.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萊劑殘留標準之權限爭議案）
7.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偵查中辯護人在場筆記權等之救濟案）
8.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
9.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公務人員考績丁等免職案）
10.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0 號判決（警消人員獎懲累積達二大過免職案）
11.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
12.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2 號判決（臺大法律學院教師評鑑案）
13.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
14.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農田水利會改制案）
15.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

二、案件類型之統計分析

（一）現階段仍多在處理依大審法聲請釋憲之累積案件

上述案件中除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係憲法訴訟法施行後受理並為新法增定之「裁判憲法審

查」訴訟類型外，其餘均為依大審法聲請釋憲之案件，而依憲訴法第 90 條¹⁵予以受理並為審判之案件。

（二）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最多

15 件案件中，人民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占 9 件（第 2、3、4、5、7、10、12、13、15 號判決）最多，如再包括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1 件則共有 10 件。其次為法院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占 3 件〔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肇事駕駛人受強制抽血檢測酒精濃度案）、111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公務人員考績丁等免職案）、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¹⁶〕，顯示法官亦漸有維護人權之憲法意識。而地方議會聲請之「地方自治保障」案件則為 1 件，即 111 年憲判字第 6 號判決（萊劑殘留標準之權限爭議案）。而公立大學聲請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亦為 1 件，即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又立法委員聲請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亦為 1 件，即 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農田水利會改制案）。

（三）宣告牴觸或違反憲法（包括變更解釋）或不符合憲法意旨之案件達 7 件

15 件案件中，宣告牴觸憲法（包括變更解釋）之案件有 7 件，即：

¹⁵ 憲訴法第 90 條：「（第 1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第 2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原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第三款前段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案件，其審理程序分別準用修正施行後第三章第一節及第八章之規定。」

¹⁶ 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係合併審理 1 件法院聲請釋憲案及 1 件人民聲請釋憲案所作成，故依聲請人之身分計算案件時，須各分別計算其 1 件。

1. 111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肇事駕駛人受強制抽血檢測酒精濃度案）
2. 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強制道歉案〈二〉）
3.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
4. 111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偵查中辯護人在場筆記權等之救濟案）
5.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
6.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
7.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

另有 1 件判決較為特殊者，其判決主文雖未宣告系爭規定違憲，但表示相關機關須於期限內有所作為，適用系爭法規始為合憲者，即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其主文表示：系爭規定「原提供為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109 年 7 月 22 日制定公布之農田水利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意旨相同）。其應照舊使用之土地，如屬人民所有，而未以租用、價購或其他方式取得權源，因其已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即應依法徵收，給予相當之補償，並於 3 年內擬定徵收補償相關計畫，籌措財源，俾於合理期限內逐步完成徵收補償，始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就宣告違憲之判決所占比例之高，幾近一半而言，應可看出憲法法庭努力發揮其維護憲政秩序及保障人民權利之功能。

肆、憲法法庭判決違憲審查之論理評析

一、爭議性較大案件違憲審查之論理評析

憲訴法施行後官方網站除公告憲法法庭之判決文書外，並同

時揭露大法官對該判決提出之協同意見書及不同意見書，使外界可以得知憲法法庭成員參與作成該判決時，就違憲審查之各方論理所表示之意見。在 15 件判決中，僅有少數判決只有協同意見書提出而未有不同意見書者¹⁷；或只有不同意見書提出而未見協同意見書者¹⁸。而多數判決則都有協同意見書及不同意見書之同時提出。15 位大法官中，對判決主文及理由，有多達總額 1/3 之 5 位大法官表示不同意見者¹⁹，表示該案件之審理過程及主文之形成，頗具爭議，而值得特別注意。在前述 15 件判決中，有多達 5 位大法官對該件判決主文及理由表示不同意見者，計有下列 4 件，因而就其違憲審查之論理，予以評析：

（一）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²⁰

本件判決以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之意旨，並違反比例原則，宣告違憲。

1. 「姓」所表彰之意義及作用，為爭議之焦點

本件判決多數意見及少數不同意見之紛歧，在於其對「姓」所表彰之意義及作用，認知及評價上之不同所致。

多數意見認為我國原住民族本無姓之概念或傳統，原住民採

¹⁷ 例如：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

¹⁸ 例如：111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公務人員考績丁等免職案）、111 年憲判字第 10 號判決（警消人員獎懲累積達二大過免職案）

¹⁹ 大法官表示不同意見之人數計算，並非以提出不同意見書之份數為準，而係包括雖未提出個人意見書，但「列名加入」於其他大法官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者亦在內。

²⁰ 本件判決有 2 份不同意見書，分別由呂太郎大法官提出及蔡宗珍大法官提出而吳陳銀、林俊益、張瓊文大法官加入。不同意見之大法官共 5 位。

漢字為其姓者，亦不真正能有認同及傳承其所屬原住民族群文化及傳統之作用（理由第 28 段）。

少數不同意見則認為即使原住民以漢字為其姓，但不能以該漢字之文字表面所代表之文化解讀，而是以該漢字為「姓」具有代表家族圖騰之意義與作用，從而子女從其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之意義，除表彰其原住民血統來源外，並有認同歸屬其父或母所屬原住民族群及傳承其文化之意涵存在。

2. 有無違反比例原則之爭論

多數意見認為原住民之（漢）姓並不足以表彰原住民文化及傳統，則系爭規定以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作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條件，並無助於達成認同原住民文化及傳統之目的。因此，其作為達成目的之手段，並不適當及必要，且因此限制具有原住民血統之人民不能取得原住民身分。乃過份侵害其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身分權，違反比例原則。（理由第 32 段）

少數不同意見則強調「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作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條件者，正是認同其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所屬原住民之文化及傳統之表彰。且除有原住民血統外，並以從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作為認同原住民文化及傳統之標準，為當時立法時由原住民族所選代表之立法委員依原住民族之共同意願所選擇決定，表示其為認同原住民文化及傳統之適當手段。故以之作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之條件，實有強固原住民族文化之主體性，並有助原住民族文化得以延續、發展之目的，並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保障、扶助原住民族之意旨，並不違反比例原則。

3. 由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申請登記其子女為原住民，是否為侵害較少之手段及足以彰顯其歸屬原住民族及認同其文化？

多數意見認為依現行法制，原住民之身分及民族別均須登記

後始得取得。並認為「由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申請登記其子女為原住民」，實即足以彰顯其認同原住民族及認同其文化。而系爭規定要求「先從姓或取名，而後才有身分」之限制手段，明顯並非侵害最小之限制手段。（理由第 29 段）換言之，認為「原住民之身分得經父母之申請登記即可取得」為侵害較小之限制手段。

惟此種論述，似是而非！蓋其所稱「原住民之身分得經父母之申請登記即可取得」所指之登記，依現行法制，應係指依戶籍法之身分登記（戶籍法第 4 條第 1 款第 9 目）²¹，而身分登記必須有能辨識其「個人別」之表徵，最明顯及最普遍通用之表徵即其姓名。因此辦理身分登記，必須先有姓名，不能沒有姓名而可辦理沒有個人別之身分登記。故所稱「以登記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說法，並不能避開須先有辨識個人別「姓名」之前提條件。從而以「由原住民身分之父母申請登記其子女為原住民」而取得原住民身分，反而是較「從原父或原母之姓或傳統名字」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更多一道「申請登記」手續之限制，反而是限制條件更多、侵害較大之限制手段。

4. 依本件判決意旨取得具原住民身分之條件將僅重視血緣因素而不再追求原住民族文化之認同

本件判決以系爭規定要求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須「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為條件，違憲。並於主文中諭示：「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2 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逾期未完成修法者，上開原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及 110 年 1 月 27 日修正公布同法第 8 條準用第 4 條第 2 項規定部分失效，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

²¹ 戶籍法第 4 條第 1 款第 9 目規定：「戶籍登記，指下列登記：一、身分登記：—（九）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原住民身分，並得辦理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依此判決主文意旨，以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已具有原住民血緣，當然取得原住民身分，並當然得辦理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亦即僅以具有原住民血緣條件為已足。從而其理由第 26 段所稱考量我國原住民族之特殊歷史地位及憲法增修條文之特別保障，具有特別重要公益目的之原住民文化認同之追求，在原住民身分之取得上，根本即不再重要，而顯示其論理之不一貫及矛盾。

（二）111 年憲判字第 5 號判決（營利事業所得跨年度盈虧互抵案）²²

本件判決認為財政部就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規定之函釋〔各該虧損年度已依同法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不計入該年度全年所得額之投資收益，應先抵減各該年度之虧損數，以其虧損數之餘額作為本年度（即列報跨年度盈虧互抵年度）純益額（即全年所得額）之扣除額〕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亦不生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問題。但同時表示「惟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跨年度盈虧互抵制度，其政策選擇影響國家財政、經濟與產業發展，並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為避免疑義，有關該管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之基準，仍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明定為宜。」

5. 系爭函釋有無「變更稅基」而違反憲法租稅法律主義為爭論之焦點

本件判理由中說明所得稅法第 42 條所規定之投資收益，就獲配之營利事業言，仍屬其收入，且因此等投資收益於獲配年度

²² 本件判決有 3 份不同意見書，分別由林俊益大法官提出、許志雄大法官提出而林俊益、張瓊文、黃昭元、謝銘洋大法官加入、以及謝銘洋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之大法官共有 5 位

並未計入該營利事業之所得額課稅，是營利事業於獲配投資收益年度，雖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經核定結果係屬虧損，但該虧損數既未將該投資收益計入，即非該營利事業之實際營業虧損；況營利事業投資於其他營利事業之原出資額折減之已實現投資損失，於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係得列報為成本費用減除（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 條規定參照）。故系爭函核係基於正確衡量營利事業實際營業盈虧所示之實質稅負能力，乃釋示應將前 10 年內各該虧損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不（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抵減各該期之虧損數，以營利事業之實際營業虧損，核定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既未逾越「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所得可能解釋範圍，且尚能符合同條但書規定適度放寬年度課稅原則以正確衡量稅負能力之立法目的，而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理由第 19 段）

少數不同意見則認為系爭函釋實質等同將原已不納入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之投資收益，回計於稅基之中，實已改變法律所規定「虧損」之意義，實質影響「稅基」之計算，等同於變更稅基，已逾越法律解釋的範圍，並違反憲法租稅法律主義。

6. 應以憲法高度審查系爭函釋之合憲性

系爭函係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就適用法規所為之釋示，為行政規則之性質。對法院並沒有拘束力（司法院釋字第 137 號、第 216 號解釋參照），但法院認為行政機關之函釋就適用法律所為解釋之見解，並未逾越法律文義可能解釋之範圍，或並未違背法律之立法意旨或目的者，仍可引用並作為其裁判之基礎或依據。換言之，行政規則性質之行政機關函釋得作為法院裁判之依據者，理論上應已通過法院之「命令違法審查」，即從裁判應適用法律之文義、立法目的及規範意旨為審查標準而認為「命令並未違背法律」。而人民仍認為法院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行政機關

函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而聲請釋憲，並經憲法法庭受理者，憲法法庭即應從憲法高度依憲法規範所揭示之原則及蘊涵之價值理念予以審查，而非僅止於審查行政機關函釋有無逾越法律文義可能解釋之範圍，或有無違背法律之立法意旨或目的而已。此正是憲法法庭之任務與一般法院功能不同之所在。

7. 系爭函釋內容已屬「應納稅額」之計算方法，涉及「稅基之構成要件」，已非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應非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即在揭示「租稅法律主義」。其意義「係指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均應以法律明定之。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租稅公平原則（釋字第 597 號、第 607 號解釋）。大法官並表示「涉及租稅客體之範圍」，並非稽徵機關執行所得稅法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顯已逾越所得稅法之規定，若欠缺法律明確授權而增加納稅義務人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者；或涉及所得稅「稅基之構成要件」，應有租稅法律主義之適用，而不得授權命令定之者，均與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意旨不符（釋字第 650 號、第 657 號解釋）。

系爭函之釋示將「免計入所得額之投資收益，先行抵減各該期之核定虧損後，再以虧損之餘額，自本年度純益額中扣除」不僅與相關法律之文義相差甚遠，且內容並已涉及「純益額之扣除額」，而屬「應納稅額」之計算方法，涉及「稅基之構成要件」，已非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依前述司法院向來對憲法第 19 條規定租稅法律主義之解釋，並不容許主管機關依其職權以行政規則性質之釋示予以規定，故應非憲法第 19 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從而少數不同意見對本件判決多數意見之批評顯得較有道理。

8. 判決主文呈現前後矛盾

本件判決主文前段既認行政規則性質之系爭函釋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而後段卻又稱「並涉及人民之租稅負擔，為避免疑義，有關該管稽徵機關核定各期虧損之基準，仍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明定為宜」，等於表示以行政規則之釋示規定「核定各期虧損之基準」事項，實有憲法上疑慮之瑕疵，而須「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明定」予以改善，正是說明「核定各期虧損之基準」事項，其實不能由行政機關依職權釋示，而應由有民意基礎之國會以制定法律之方式予以明定，或由法律為具體明確授權，始符合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之要求。從而本件判決主文之前、後段實有矛盾，並突顯認為系爭函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不牴觸之論理及結論極為勉強及薄弱，而欲藉諭示「仍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明定為宜」予以補強。

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時代作成之司法院解釋所為之「警告性解釋」，對立法者及相關主管機關並沒有拘束力，實際上亦不發生相關機關因有此「警告」即積極修法或立法之作用及效果。僅是大法官對健全法制之自我期許。然現已進入憲法法庭之時代，即應強化憲法法庭判決之效力及拘束力，如要健全法制，貫徹法律保留原則及租稅法律主義，且真能督促立法者及相關主管機關積極修法或立法以彌補現有法律之缺漏者，對既有法規實已屬違憲卻又極為勉強甚至曲解其仍為「合憲」，但又要求其修法，實乃緣木求魚。故對既有法規認其實有憲法上之疑慮，與憲法規範意旨及保障人權之價值理念不符者，即應斷然判定其違憲，才能有效促使修法或立法，並使所期許之健全法制真正能夠實現。

（三）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²³

本件判決宣告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簡抗字第 13 號民事裁定牴觸憲法，應予廢棄，發回最高法院。

1. 本件為憲訴法引進「裁判憲法審查」訴訟類型後之首件案例，特別重視其受理之程序要件及憲法法庭之審理界限

本件為憲訴法引進「裁判憲法審查」訴訟類型後之首件案例，憲法法庭如何適用相關法規，對以後相同訴訟類型，將有指標性之標竿作用。因此如何審查其符合「裁判憲法審查」之訴訟要件，尤其如何認定其符合憲訴法第 61 條第 1 項所規定「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之情形，必須有所闡明。且由於係對「法院確定終局裁判」之憲法審查，難免有「第四審」之疑慮，因而須就其審理界限加以釐清，避免司法救濟體系之混淆而動搖確定終局裁判之效力及法安定性而損傷法院之威信。因此，本件判決先指出系爭裁定涉及法院為跨國父母交付未成年子女之暫時處分時，如何根據憲法課予國家對兒童之保護義務規定，判斷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以及於此程序中，是否應給予未成年子女如何之陳述意見機會，始符憲法正當程序要求等基本權。又此等問題於往後案件均可能一再發生，且無法從憲法規定文字直接獲得解答，是有澄清必要，因而具憲法重要性。又本件裁判憲法審查聲請，除涉及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親權外，亦涉及未成年子女受憲法保障之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基本權利。從而，認系爭裁定憲法審查之聲請，符合憲訴法第 59 條第 1 項及第 61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予受理。（理由第 21、22 段）

²³ 本件判決共 1 份不同意見書，由林俊益、張瓊文、黃昭元、楊惠欽、蔡宗珍 5 位大法官共同提出。

至於憲法法庭對「法院確定終局裁判」之憲法審查界限，則強調憲法法庭僅得於法律之解釋與適用構成違憲時，始得介入審查。而如何判斷是否構成違憲，一般而言，當各級法院對於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係基於對基本權根本上錯誤之理解，且該錯誤將實質影響具體個案之裁判；或於解釋與適用法律於具體個案時，尤其涉及概括條款之適用，若有應審酌之基本權重要事項而漏未審酌，或未能辨識出其間涉及基本權衝突，致發生應權衡而未權衡，或其權衡有明顯錯誤之情形，即可認定構成違憲。至訴訟程序中之指揮進行，原則上屬各級法院權責，惟若違反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者，亦應同受裁判違憲審查。（理由第 30 段）換言之，憲法法庭係從憲法高度，以維護憲法保障人權之價值理念、正當法律程序及憲政秩序之目的，審查各級法院在法律之解釋或適用上，有無違背憲法保障人權之價值理念及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致使其具體個案之裁判結果與憲法意旨不合。

2. 本件聲請人為母親身分能否主張其未成年子女之憲法上權利並據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以及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判斷權衡，是否較屬事實之認定問題，並非單純之法律解釋或憲法解釋問題，為爭議之焦點

少數不同意見認為本件聲請人係以母親身分，聲請改定其未成年子女之親權行使，並進行後續有關暫時處分程序與抗告救濟程序，進而以自己名義提起本件聲請，其未成年子女並非系爭裁定一至三²⁴之當事人，亦非本件聲請之聲請人。子女

²⁴ 臺北地院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以 108 年度家暫字第 46 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一）：「（一）甲母應將未成年子女丙女交付乙父。（二）於臺北地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212 號改定親權之一審裁定前，乙父得攜未成年子女丙女出境至義大利同住。（三）甲母得自交付未成年子女丙女後，在子女住義大利期間，

（含未成年子女）於憲法上所享有之各種憲法上權利，尤其具人格權屬性之權利，其權利主體並不擴及子女之父母，是聲請人無權主張其未成年子女之憲法上權利並據以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並認系爭裁定一係於未成年子女丙女經母自義大利帶返臺灣之 9 個月內作成，且因丙女前已在義大利生活 1 年多適應良好而作義大利已屬丙女新慣居地之事實認定。且為避免跨國環境改變而引起語言及生活適應問題，其作成甲母應將未成年子女丙女交付乙父並得帶至義大利同住之暫時處分，係為維持「繼續性原則」並符合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且有急迫性與必要性。

多數意見則認為法院酌定或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程序，或於此程序中所為交付子女之暫時處分程序，父母及該未成年子女，即為該程序之實質當事人。於父、母之一方對於確定終局裁定聲請憲法審查者，除涉及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親權外，亦涉及未成年子女受憲法保障之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基本權利。從而，系爭裁定三憲法審查之聲請，符合憲訴法第 59 第 1 項及第 61 條第 1 項之規定，應予受理。（理由第 21、22 段）

每半年與子女在臺灣同住二週，日期由兩造自行協議定之，子女之機票費用由二造各負擔二分之一。（四）未成年子女丙女住義大利期間，甲母得於不影響子女日常作息下，與子女以書信、通訊軟體或電話等方式聯絡。（五）其餘聲請駁回。」甲母對此裁定提出抗告，經臺北地院於 2021 年 10 月 27 日以 108 年度家聲抗字第 122 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二）駁回抗告。甲母再為抗告，經最高法院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以 111 年度台簡抗字第 13 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三，為確定終局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換言之，「系爭裁定一」為改定親權事件繫屬中之暫時處分核發事件（內容為甲母應將未成年子女丙女交付乙父，且於改定親權事件之本案一審裁定前，乙父得帶丙女出境至義大利同住），而系爭裁定二及三係系爭裁定一之抗告裁定（內容均為駁回抗告）。

多數意見並強調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又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同受憲法之保障，維持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原則上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理由第 32 段）並認跨國父母交付子女事件之暫時處分，繼續性原則（或維持現狀原則）亦為判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重要原則。於法院為跨國父母交付子女事件之暫時處分時，因暫時處分僅為本案裁判前，為因應緊急狀況下所為暫時性之必要措置，從而除非基於十分急迫而強烈之必要性（例如現居地之父或母，有虐待、傷害未成年子女，或該父或母失去照護未成年子女之能力，暫時無法恢復，或該現居地發生疫情、戰爭等重大事故，致未成年子女必須暫時性離開現居地等），不能率爾違反繼續性原則甚至違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迫使未成年子女於本案裁定確定前「暫時」離開其原慣居地而移居至他國，否則除對父母親權之行使有所影響外，亦違反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意旨，構成對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侵害。（理由第 42 段）就繼續性原則之判斷言，依系爭裁定一、二所認定之事實，自乙父於 2017 年 12 月 12 日將丙女帶至義大利起，至甲母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復將丙女帶返臺灣為止，丙女居住義大利之期間約 1 年。自甲母於 2019 年 1 月 20 日將丙女由義大利帶返臺灣起，至系爭裁定二於 2021 年 10 月 27 日駁回甲母之抗告止，丙女居住臺灣之期間約 2 年 9 月（至系爭裁定三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裁定止，居住臺灣之期間約 3 年 1 月），其於義大利及臺灣之生活及就學適應均佳。依此事實，丙女居住臺灣之期間遠較居住義大利為長，其於臺灣之生活及就學適應亦佳，臺灣可否認為已成丙女之新慣居地？事涉甲母應否將丙女交付乙父，讓丙女暫時隨乙父移居義大利之重大改變，自

為法院於判斷丙女最佳利益時所應審酌之事項。尤其因丙女年紀漸長，對居住地之改變，更可能有適應之問題，從而使丙女暫時離開居住生活及就學適應亦佳之臺灣，而移居至義大利，是否符合丙女最佳利益？為法院所應審慎審酌之事項。然系爭裁定二維持系爭裁定一之見解，仍認為居住 1 年之義大利為丙女之新慣居地，就已居住 2 年 9 月，且生活及就學適應亦佳之臺灣，是否已為丙女之新慣居地，並未有所審酌，應認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判斷上，有應審酌而未審酌之事項，與憲法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意旨，有所不符。（理由第 45 段）

此外，多數意見並認為尊重未成年子女人格獨立與主體性，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之重要內涵。因此，於有關決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家事非訟程序，應基於尊重未成年子女程序主體性，使未成年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此為憲法所保障審酌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正當法律程序。（理由第 52 段）丙女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系爭裁定一作成時，已 5 歲 8 月並入學，於 2021 年 10 月 27 日系爭裁定二作成時，丙女更已近 8 歲，且返臺已 2 年 9 月，則法院於暫時處分及抗告裁定前，當有充裕時間，使丙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然系爭裁定一、二卻未踐行此一程序，即分別為甲母應將丙女交付乙父之暫時處分及駁回甲母抗告之裁定，侵害丙女受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權利，並因而影響聲請人親權之行使。（理由第 60 段）故系爭裁定二關於未成年子女丙女最佳利益之判斷，有應予審酌而未予審酌之情形，牴觸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丙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意旨。又未於裁定前使未成年子女丙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侵害未成年子女丙女受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權利。系爭裁定三維持系爭裁定二前開見

解，亦應認為與憲法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意旨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所牴觸，且因而影響聲請人親權之行使，系爭裁定三應予廢棄，發回最高法院。（理由第 62 段）

3. 本件判決強調「繼續性原則」及未成年子女就其意願所為之陳述意見，於親權酌定或改定事件中為應審酌之重要因素

本件判決雖特別指出本件判決僅就判斷未成年子女丙女最佳利益時，於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原則及繼續性原則，有無應審酌而漏未審酌之情形，以及應使丙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就系爭裁定三所持見解進行憲法判斷，並非謂本件聲請案之原因案件（暫時處分），法院應裁定將丙女交付父或母，何者始符合丙女最佳利益。故依本判決發回後，法院如何判斷丙女最佳利益，仍應由法院依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之意旨，本於其權責為之，非在本判決判斷範圍內，應併予敘明。（理由第 63 段）但受此判決意旨之影響，法院須使丙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而在其陳述中除非明確表示願與乙父在意大利共同生活之意願外，在尊重「繼續性原則」下，改定親權「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勢將被重新檢討。除非有新的事證顯示甲母有「不適合行使或負擔對於丙女之權利義務之狀態」；或丙女成長環境不佳已影響其人格之健全發展等情事發生，並基於丙女最佳利益之審酌與判斷，即有改定親權「暫時處分」之必要。而有無此類情事以及其他判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應審酌之因素，則屬事實審法院應調查及判斷之權責。而對於原因案件之本案審理，本件判決意旨所強調「於未成年子女丙女最佳利益之判斷時，應使有表意能力之未成年子女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尊重未成年子女意願原則及繼續性原則」，應有拘束力，而受其影響。

（四）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²⁵

本件判決主文宣告四項：

第 1 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不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第 2 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憲法第 22 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

第 3 項：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得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資料庫儲存、處理、對外傳輸及對外提供利用之主體、目的、要件、範圍及方式暨相關組織上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等重要事項，於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9 條、第 80 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中，均欠缺明確規定，於此範圍內，不符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要求，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或其他相關法律，或制定專法明定之。

²⁵ 本件判決有 1 份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及 5 份部分不同意見書提出。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由蔡宗珍大法官提出而林俊益、張瓊文大法官加入。5 份部分不同意見書分別由許宗力大法官、吳陳鐔大法官各別提出、黃昭元大法官提出而許宗力、許志雄、謝銘洋、楊惠欽大法官加入、以及謝銘洋大法官、楊惠欽大法官各別提出。不同意見之大法官共有 6 位。加上僅部分不同意見之大法官 3 位，共有 9 位。可見本件爭議性很高。

第 4 項：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之提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於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由相關法制整體觀察，欠缺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於此範圍內，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明定請求停止及例外不許停止之主體、事由、程序、效果等事項。逾期未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者，當事人得請求停止上開目的外利用。

上述四項中，第 3 項及第 4 項較少爭議，但 1 項及第 2 項則爭議甚多，評述如下：

1. 提供個人高敏感性資料給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為醫療、衛生等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以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為條件，是否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侵害已降至最低之可能性而屬侵害最小手段，因而不違反比例原則及不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為爭議之焦點

本件判決主文第 1 項宣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第 4 款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健康檢查……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與法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尚屬無違，不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其理由為系爭規定採取強制人民容忍其個人健保資料，供此類為特別重要公益之醫療、衛生法定目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而蒐用，其手段應有助於其目的之達成。（理由第 51 段）系爭規定課予採取去識別化措施之義務，使一般人採取當時存在技術與合理成本，在不使用額外資訊時，不能識別特定當事人。雖個人健保資料於客觀上非無以極端方式還原而間接識別特定當

事人之可能性，惟系爭規定所採之去識別化手段已足大幅降低蒐用個人健保資料所生之個人資訊隱私權所生之侵害。（理由第 54 段）而且系爭規定除已明定目的限於醫療、衛生（排除其他目的），暨蒐用主體以公務機關及學術研究機構為限（排除其他人）外，並明定以統計或學術研究且必要為另一要件，亦已排除非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者，暨非必要之統計及學術研究，是系爭規定應與個人資訊隱私權之最小蒐用原則尚屬相符。（理由第 55 段）系爭規定所犧牲之個人敏感資訊隱私權固屬特別重要法益，但公務機關、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法定目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係為救治或預防疾病，事涉公眾之健康，與社會集體安全之維護必要相關，更是特別重要公益。兩者相權，應認為系爭規定之手段原則上尚符合相稱性要求。（理由第 57 段）

但判決主文第 2 項又表示：「由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而有違憲之虞，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憲法第 22 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其理由為：就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而言，除應以法律明確訂定蒐用個資之目的及要件外，應配合當代科技發展，運用足以確保資訊正確及安全之方式，並對所蒐集之個資採取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本旨（司法院釋字第 603 號解釋參照）。前述組織上與程序上必要之防護措施中，個資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為重要之關鍵制度。此一獨立監督機制之目的，在於確保個資蒐用者對於個資之蒐用，均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以增強個資蒐用之合法性與可信度，尤其個人健保資料業已逸脫個人控制範圍，如何避免其不受濫用或不當洩漏，更有賴獨立機制之監督。依系爭規定為高敏感特種個資之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者，因

醫療、衛生之範圍甚廣，於具體個案中是否合於系爭規定所欲達成之特別重要公益目的，可能因統計或學術研究之內涵而有差異，是就為醫療、衛生目的之統計或學術研究原始蒐集目的外利用之申請者，其是否確實符合特別重要公益標準，以使所犧牲之法益與所欲保護之法益不致輕重不相稱而失衡，暨是否確有強制蒐用必要等事項之審酌即屬之。（理由第 61 段）。惟由個資法暨其他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均欠缺個資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自有不足，而有違憲之虞。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憲法第 22 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理由第 62 段）

少數不同意見則認為個案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是否均為追求特別重要之公益，且資料是否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已達到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度，以及提供之資料是否屬於必要之範圍，均須有獨立的監督組織與嚴謹的監督程序有效地就個案進行審查，始能有效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亦即健保個資於逸脫出個資主體之掌控後，仍應受到獨立之第三方為一定程度之控制，將高敏感特種個資遭濫用或不當外洩的可能性減至最低，才符合最小侵害要求。因此認為系爭規定尚具有此等缺失，而不能通過嚴格審查，應認違反比例原則之要求。並認為多數意見既在主文第 2 項強調「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保障之重要性，且認為其欠缺有「違憲之虞」，並要求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憲法第 22 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則欠缺此「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即在表示現有之相關規定並非已將侵害個資之可能性減至最低，亦即系爭規定雖已要求「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仍非最小侵害之手段，而違反比例原則，並批評主文第 1 項及第 2 項

乃相互矛盾。此項批評有其道理。

2.對現行個資保障法制欠缺獨立監督機制而作成「有違憲之虞」之諭示，法效有限

本件判決第2項就現行個資保障法制欠缺獨立監督機制作成「有違憲之虞」之諭示，實際上僅有「示警」作用，雖同時諭知相關機關應在3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但此項應立法之諭知，其實對相關機關並不具有實際拘束及督促之效果。換言之，相關機關未遵照此項諭知，未在3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並不因此而使仍欠缺獨立監督機制規定之個資保障法制即發生違憲而失效之效果。相關機關仍可消極抱殘守缺，怠於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多數意見既然認知「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不足」，並要求「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3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憲法第22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實不若少數意見之主張及所持理由，以系爭規定及相關法律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規定，違反憲法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之意旨，宣告違憲並定期失效，並諭知相關機關應在該定期失效前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將更能有效督促相關機關在期限內積極建立相關法制，以完足憲法第22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保障之目的。

二、其他判決之違憲審查論理有商榷餘地而應予評析者

15件判決中，除上述有違總額1/3之5位大法官表示不同意見之4件判決，應予注意其違憲審查之論理外，其他判決雖表示不同意見之大法官人數較少，但其違憲審查之論理仍有值得商榷而應予評析者。例如下列2件判決，分述如下：

（一）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強制道歉案〈二〉）²⁶

本件判決係合併 4 件人民聲請釋憲案，皆以確定終局民事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牴觸憲法，聲請宣告違憲，並聲請變更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其中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經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表示「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之保障。」但本件判決主文則宣示：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所稱之「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始符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於此範圍內，應予變更。」其所持理由為：「強制公開道歉係直接干預人民是否及如何表達其意見或價值立場之自主決定，而非僅涉及客觀事實陳述之表意，顯屬對高價值言論內容之干預。」（理由第 9 段）「思想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包括「不得以追求其他目的（如維護名譽權等）為由，強制人民表態，以維護人民之思想自由」（理由第 14 段）。「強制道歉係強制人民不顧自己之真實意願，表達與

²⁶ 本件判決有 1 份部分不同意見書（由詹森林大法官提出、黃瑞明大法官加入其中壹及參之部分）；2 份不同意見書（1 份由蔡明誠大法官提出、吳陳鐸大法官加入；另 1 份由黃瑞明大法官提出、詹森林大法官加入）。不同意見之大法官共有 4 位。

其良心、價值信念等有違之表意。個人是否願意誠摯向他人認錯及道歉，實與個人內心之信念與價值有關。於加害人為自然人時，強制道歉除直接限制人民消極不表意之言論自由外，更會進而干預個人良心、理念等內在精神活動及價值決定之思想自由。此等禁止沉默、強制表態之要求，實已將法院所為之法律上判斷，強制轉為加害人對己之道德判斷，從而產生自我否定、甚至自我羞辱之負面效果，致必然損及道歉者之內在思想、良心及人性尊嚴，從而侵害憲法保障自然人思想自由之意旨。（理由第15段）

然本件判決仍有可批評之處如下：

1. 以「思想自由」為憲法第22條所保障之自由權利，而強調其「應受絕對保障」，其憲法規範依據及論理邏輯均有問題

本案判決引用釋字第567號解釋理由書所諭示「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存續，具特殊重要意義，不容國家機關以包括緊急事態之因應在內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縱國家處於非常時期，出於法律規定，亦無論其侵犯手段是強制表態，乃至改造，皆所不許，是為不容侵犯之最低限度人權保障。」而強調「思想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包括「不得以追求其他目的（如維護名譽權等）為由，強制人民表態，以維護人民之思想自由」（理由第14段）。依據此段論述，思想自由是「言論自由之基礎，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則其憲法規範依據，應是保障言論自由之憲法第11條以及保障生存權所內涵之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憲法第15條。然本件判決理由第18段表示『系爭規定所稱之「適當處分」，應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情

形，始符憲法第 11 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及第 22 條保障人民思想自由之意旨。』卻指出保障「思想自由」之規範依據為憲法第 22 條，並非第 11 條及第 15 條。而為何不以第 11 條及第 15 條為其憲法依據，並未說明其理由。若「思想自由」為憲法第 22 條概括補充規定所稱「亦受憲法保障之人民其他自由及權利」，由於該條所保障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係以「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為前提條件。既然有此前提條件之限制，則「思想自由」之保障，即非無任何限制條件之保障。而「受有限制條件之保障」，與「應受絕對保障」涵意不同，保障之程度更有強弱之差別，亦即「受有限制條件之保障」並不等於「受絕對保障」。從而本判決以「思想自由」為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自由權利，而強調其「應受絕對保障，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之論斷，其憲法規範依據及論理邏輯均有問題。

2. 變更釋字第 656 號解釋之違憲論理牽強

（1）強制公開道歉係直接干預人民是否及如何表達其意見或價值立場之自主決定，而非僅涉及客觀事實陳述之表意，顯屬對「高價值言論」內容之干預。（理由第 9 段）

按已被法院確認為「不法損害他人名譽之行言」並非「高價值言論」，而屬言論自由之濫用，並不受憲法之保障，且得受法律之限制。從而要求加害人對自己所為不法損害他人名譽之行言重為價值判斷與表態，雖干預人民是否及如何表達其意見或價值立場之自主決定，而屬不表意自由之限制，但並非即屬對「高價值言論」之干預。

（2）名譽權遭侵害之個案情狀不一，亦有僅屬私人間爭議，且不致影響第三人或公共利益者，是填補或回復被害人名譽之「立法目的是否均屬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尚非無疑。（理由第 10 段）

然加害人之「道歉行為」縱然未在達成「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之目的，但本件判決亦指出：「出於自願且真誠向被害人道歉，不論是表達其內疚或羞愧，皆為對被害人所受傷害之同理心表現，可讓被害人獲得精神上的安慰，感到受尊重，獲得安全感，從而重建對他人之信任。透過道歉，甚可宣示社會之共同價值觀，因而重建雙方及社會的和諧。」（理由第 10 段）即加害人「道歉行為」可讓被害人獲得精神上的安慰，並有重建雙方及社會的和諧之作用，即不僅填補個人損害而已，亦有助於「社會和諧」公益目的之達成。而要求加害人對自己所為不法損害他人名譽之行言重為價值判斷與表態，僅對不法加害人個人之不表意自由所為之限制，並不須有維護「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之目的為必要，而有助於「社會和諧」公益目的之達成，應為已足。故其手段與目的之間，並非不符合比例原則。

3. 變更第 656 號解釋，並未論證說明何以該解釋已命道歉之內容，「不應有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之限制，仍有「違憲」之處，而應變更，其論理不足

本件判決受理於大審法時期，雖以確定終局民事判決所適用之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牴觸憲法，聲請宣告違憲，並聲請變更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解釋，但其實係對法院判決認為該條所定「恢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得包括「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見解，質疑其違憲，而聲請釋憲者，故其實質上實為「裁判憲法審查」之類型。因此在判決論證上，必須嚴守係在維護憲法重要原則而具有「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人民基本權利所必要者。又司法院解釋並非不得補充或變更，但因解釋有拘束全國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故其補充或變更解釋應相當慎重，尤其變更解釋，更影響人民對法之確信及法之安定性，認舊有解釋違憲予以變更者，其論理尤須嚴謹周延。然本件判決變更釋字第 656 號解釋之憲法

規範依據有誤及論理牽強，一方面低估不問是否出於真意之公開道歉表態，多少均有撫平被害人名譽受損之傷痛並促進和諧之功能；另一方面不顧釋字第 656 號解釋已將判命道歉之內容，「不應有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之限制，並就此限制如何尚有不足或「違憲」之處，未予論證，即輕率推論「命公開道歉」仍將產生「自我否定、甚至自我羞辱之負面效果」，並跨大上綱至「必然損及其內在思想、良心及人性尊嚴」之地步，並進而將不法侵害他人名譽而應單純表態「道歉」所涉及之不表意自由之限制，拉高至等同於對個人內心信念與價值判斷之高價值層次「思想」所為之限制與侵害。依此推理之結果，凡「不表意自由之限制」者必定是「思想自由之限制」而不問要求表意之內容是否真與高價值層次之「思想」信念有關。如此之論理邏輯相當牽強，實有可議之處。且其否定向來可定紛爭、建和諧而「判命加害人道歉」以回復被害人名譽之多年傳統方法，其後果如部分不同意見書所言，並嚴重傷害多年來曾「判命加害人道歉」之普通法院法官對法之確信及其尊嚴。

4. 作「補充解釋」宣示「道歉」不得「代履行」，而非「變更解釋」終結法院命公開道歉以消彌怨對並促進社會和諧之功能

必須一提者，法規範審查案件，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不違憲或作成其他憲法判斷者，除有因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或相關社會情事有重大變更，認有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者，得分別依第三章所定程序，聲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之情形外，任何人均不得就相同法規範或爭議聲請判決（憲訴法第 4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參照）。本件因依大審法已受理繫屬，雖無上開法條之適用（憲訴法第 90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但其規定之意旨仍可供參考。

本件系爭法規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並未被司法院釋字第 656 號宣告違憲，且諭示「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之保障。」則依上開法條意旨，如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並未修正，或相關社會情事未有重大變更，釋字第 656 號即無重行認定與判斷之必要，即不應受理，更無理由變更原來解釋。如本件判決多數意見認為『法院如以判決命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並得由被害人逕以加害人之名義刊載道歉啟事，再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強制執行法第 127 條第 1 項規定參照），實無異於容許被害人以加害人名義，逕自違反加害人自主之言論。』（理由第 12 段），係屬過份手段者，亦不須因此廢棄或變更系爭解釋，而若依少數不同意見之主張（見黃瑞明大法官提出、詹森林大法官加入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作「補充解釋」宣示法院判令加害人公開道歉，不得「代履行」，不適用強制執行法第 127 條第 1 項規定，應為較妥適之解決方法。即本件判決改作「補充解釋」而非「變更解釋」終結法院命公開道歉以消弭怨對並促進社會和諧之功能。

（二）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農田水利會改制案）²⁷

2020 年 7 月 22 日制定公布、自同年 10 月 1 日施行之農田水利法，將原為公法人之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下所設置之灌溉管理組織（農田水利署），辦理原由農田水利會推行之農田水利事業，並將農田水利會之資產及負債於改制後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其所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聲請

²⁷ 本件判決有 1 份不同意見書由蔡明誠大法官提出而吳陳鑽大法官加入。

人費鴻泰等 38 位立法委員，以農田水利法相關規定侵害農田水利會受憲法保障之結社權及財產權，依大審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之規定，聲請釋憲。

本件判決主文共宣示 6 項，其中第 1 項：農田水利法第 1 條規定：「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續，促進農田水利事業發展，健全農田水利設施之興建、維護及管理，以穩定供應農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水及擴大灌溉服務，並維護農業生產與提升農地利用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水利會之改制事宜，特制定本法。」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且不生侵害憲法第 14 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問題。

第 3 項：農田水利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農田水利會改制後資產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依前條第 1 項規定設置之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且不生侵害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問題。第 5 項：農田水利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不再適用。」不生侵害憲法第 14 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問題，亦不生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

上述認為並不生侵害人民結社自由及財產權保障問題之違憲審查論理，頗有討論空間，而為本文評述本件判決之重點。

本件判決宣示農田水利法相關規定不生侵害憲法第 14 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及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問題。其所持理由為：憲法第 14 條規定人民有結社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以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權利，並確保團體之存續、內部組織與事務之自主決定及對外活動之自由（司法院釋字第 479 號及第 733 號解釋參照）此結社自由，僅在保障人民

是否成立私法上團體，以及參加或不參加此團體之自由，並不包括人民有組成得行使公權力之公法人之自由在內。（理由第 55 段）農田水利會係依法律規定而設立之公法人，並非人民基於憲法第 14 條保障之結社自由所成立。從而，系爭規定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納入公務機關，消滅其公法人之法人格，亦不生侵害農田水利會原有會員受憲法第 14 條所保障之結社自由問題。（理由第 56 段）又憲法為人民權利保障書，保障人民之權利乃憲法核心目的。作為為人民服務之國家，自無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財產權之基本權利。公法人既為分擔國家任務而存在，其財產之取得，如本於公法人之地位而取得，自亦不受憲法第 15 條規定所保障。公法人之財產，非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理由第 59 段）並引用史料說明日治時期臺灣水利組合之財產為公有財產（理由第 63 段至第 69 段）而日治時期臺灣水利組合之財產由我國政府接收為公有財產。（理由第 71 段、第 72 段）1955 年水利法修正後農田水利會更取得公法人地位。其資產之取得，不論係來自政府接收之日產，或依法令對於其會員徵收工程、管理、維護費用、工程分攤費用、滯納金、會費、建造物及餘水使用費用、捐款及贈與、接受政府補助或其他依法之收入，甚至為舉辦工程而依法徵收土地，均係基於其為公法人之地位而取得之公有財產，此等財產均非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是系爭規定將農田水利會所有之公有財產，明定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繼續作為推動農田水利之經費，自不生侵害農田水利會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之問題。（理由第 74 段）然本件判決上述違憲審查之論理，仍有下列可議之處：

1. 本件判決所依據之事實交待不清，所持理由之論理邏輯不夠嚴謹

（1）人民組合之團體組織因公權力介入監督與管理，並賦

予法人資格，即可使該人民團體組織成為「公法人」性質？

本件判決理由中指出臺灣農田灌溉事業，於清領時期，有關灌溉所用之埤圳，多以民間自行出資興建、維修為主。因埤圳之利用、經營所生權利義務關係，依契約或舊慣之私法關係處理。

（理由第 26 段）於日治時期，依當時法令，凡以水田、旱田灌溉為目的而設之水路、池塘及其附屬物（包含與前項水利有直接關係之河川池沼之堤防），行政官廳認定其與公共利害有關者，即為「公共埤圳」，其區域由行政官廳指定，區域內利害關係人（指因公共埤圳之設置而受有利害之土地業主、佃戶及埤圳主），應依臺灣總督之規定制定規約，並經行政官廳認可。行政官廳認為必要時，得代為徵收水租及費用，交付予權利人。前開徵收金，準用臺灣國稅徵收規則中關於滯納處分之規定。關於公共埤圳之一切水利爭議，由行政官廳裁決之。（理由第 29 段）且為使公共埤圳經營所需資金得向日本勸業銀行以貸款取得，公共埤圳之利害關係人得經行政官廳之認可，組織組合。並承認「公共埤圳組合為法人」，以管理人代表之。公共埤圳組合，依規約所定，得賦課徵收水租及費用。（理由第 31 段）本件判決即因此認為此時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已為成文法上國家機關之一部而分擔統治權作用之公法人」。（理由第 32 段）

上述論斷公共埤圳組合法人，「已為成文法上國家機關之一部而分擔統治權作用之公法人」之結論，有待商榷。如本件判決理由所指，公共埤圳之利害關係人（指因公共埤圳之設置而受有利害之土地業主、佃戶及埤圳主）得經行政官廳之認可，組織公共埤圳組合法人，使其具有權利能力之主體地位而得向日本勸業銀行取得貸款。（理由第 31 段）則此種組合法人之形成，是由私人組成團體組織，以取得法人資格，俾能取得銀行貸款為目的，而與為賦予執行公共任務之目的而由公權力主體設置之公法

人，顯然有別。換言之，此種由私人組成之團體組織，仍應是私法性質之私法人。縱令「行政官廳認為必要時，得代為徵收水租及費用，交付予權利人」亦僅是公權力介入強制義務人履行其私法性質之規約所定應繳納水租及費用之義務。且此公權力之介入係由「行政官廳」為之，並非由「公共埤圳組合法人」行使，故公共埤圳組合法人並無行使公權力之權限，亦與「公法人」係由法律賦予執行公共任務並為達成此任務而賦予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之本質及條件不合。

又嗣後在原來灌溉及排水目的之外並增加預防水害之公共任務而成立之「水利組合法人」，亦係由民間自主成立，並經組合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包含組合區域總面積三分之二以上之土地所有人同意而制定組合規約，故是由人民組成之自治團體。縱令代表組合之組合長由地方知事或廳長直接任命、水利組合法人之每年歲出歲入預算之製作或變更、追加，以及關於一定財產之管理、收支或處分等，應受監督官廳之認可等。（理由第 38 段）此種人事任命之介入及財務管理之監督，固然公法色彩濃厚，但僅表示水利組合法人之內部組織及運作上應受政府之嚴密監督而已。然水利組合法人因此是否亦具有公法人對外行為應具備「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之特徵及條件並未交待及有所論述，即作成「可知水利組合性質上亦為公法人」（理由第 39 段）之結論，此種論斷實屬牽強而不具充足理由。

（2）日治時期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所管有埤圳灌溉設施之財產屬於公有或私有？

日治時期之「官設埤圳」，係由政府直接經營之灌溉排水路、池塘及工作物，包含與水利有直接關係之土地及其定著物。官設埤圳區域內之土地及其定著物由政府取得，其他權利消滅，依官設埤圳而受水利之土地業主、佃戶、典主或為動力或其他目

的而使用官設埤圳之水者，應負擔水租，水租徵收準用臺灣國稅徵收規則，有關官設埤圳水利之爭議，由臺灣總督裁決。（理由第 34 段）依此，屬於官設埤圳者，其產權及經營權均源於國家，並不因其後成立「官設埤圳水利組合」，而受影響。其法律地位及性質有如學理上所稱「公法上營造物」。但官設埤圳組合之設立並非在取代原已存立之民間團體組成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而是與其並存。嗣後原有官設埤圳或予廢止，或重新編為公共埤圳，或與公共埤圳組合合併為水利組合（理由第 42 段）。由官設埤圳重新編為公共埤圳之組合法人，其財產固屬公有財產，而與民間公共埤圳組合合併為水利組合者，其財產則混有公有及私有財產，但不能因此即認為所有水利組合之財產均屬公有財產，甚至更錯誤推論所有民間團體所成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之財產亦屬公有財產。

要使民間團體所成立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之財產成為公有財產，須經收購或徵收程序。事實上日本政府雖亦有透過收購私有埤圳，將埤圳公共化，而不再屬於私產之動作（見關係機關農委會之陳述，理由第 19 段；黃瑞明大法官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然此項收購私有埤圳之行為是否遍及所有當時存在之民間團體所成立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並包括戰後及 1946 年後歷經改組為農田水利協會、水利委員會而現存於全臺地區之 17 個農田水利會？並未有具體明確之資料予以追溯論證，即單以其組織性質上為「公法人」而當然認其所有財產為「公有財產」（理由第 68 段），並以其應屬「日本官有財產」，戰後於 1947 年即應由我國臺灣省政府接收而成為「公有財產」（理由第 71 段）。然此種論斷，並未有日本政府已收購「全部」私有埤圳之確實論證予以支持，且當時民間團體所成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未必可認為是「公法人」，前已述之，從而以其為「公法人」為前提而認其財

產應為「公有財產」所作之推論，即難以成立。

2. 自治團體之農田水利會因是公法人而不能享有憲法第 14 條所保障之結社自由權及以民主方式由會員決定會務之自主權？

（1）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所代表之意義

依我國水利法之規定，人民興辦水利事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依法組織水利團體或公司，及依法取得水權登記，並建造及維修防水、引水、蓄水、洩水等水利建造物，提供農業灌溉用水，而向使用人收取費用。此項收費之方式與計算基準，由興辦水利事業人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定（水利法第 14、15、16、18、27、28、46、49、89 條規定參照）。此項收費關係是使用者使用水利團體組織登記取得之水權及其建造之水利建造物而得以取得灌溉用水所應交付之對價，其間無須亦無公權力之作用，因而為私法性質之供給灌溉用水之權利義務法律關係。故於日治末期雖將民間團體所成立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改組或合併為水利組合法人，但其私有埤圳財產並未被日本政府收購為公有財產者，於戰後依我國水利法之規定，其組織及性質，即屬人民所組織之水利團體而興辦水利事業者。無論其後依我國法制，改稱農田水利協會、水利委員會或農田水利會，其為人民自治團體組織並私有埤圳財產之法律地位，並未改變。

雖 1955 年修正之水利法第 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其中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視各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協助政府推行水利事業。」第 3 項規定：「前項水利自治團體為公法人，其組織規程由省政府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之。」以及其後法規修正將「水利自治團體」改為「農田水利會」，並明定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但此公法人之意義，主要在表示農田水利會除對農民有供給灌溉用水之權責外，並兼有協助防洪之公共任務而帶有「公」之目的而已。而課予人民自治

團體有協助執行公共利益之任務，但並未賦予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者，並不因此即可使該人民自治團體成為實質上之「公法人」。換言之，人民依民法或人民團體法組成之社團法人，並不因其係為公益目的而設立，或其章程規定以實現或維護公共利益為宗旨者，即可認為是「公法人」。公法人應具有行使公權力權限以達成特定行政目的之特徵，始為真正之公法人。而農田水利會從事水利事業，主要目的在對農民供給灌溉用水，縱使亦有協助執行防洪公共利益目的之任務，但為達成此目的或任務，並未被賦予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故法律雖承認其為「公法人」，但其實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執行特定具有專業之公共任務及達成特定行政目的而設置，並賦予行使公權力之權限以達成該公共任務或行政目的而為行政行為之一般「公法人」，有所不同。

（2）農田水利會並非行使公權力之主體，仍應受憲法基本人權之保障

憲法保障人民基本之自由權利，係用以防止及對抗國家行使公權力之侵害。因此行使公權力之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係人民對其主張憲法保障之自由權利受其侵害之抗爭對象。從而行使公權力之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乃屬應尊重及保護人民基本自由權利之「義務人」，而非權利人，故基本上並不能行使或主張屬於人民並受憲法保障之基本自由權利。惟農田水利會雖法律賦予「公法人」之地位，但就其推行水利事業之行為，並未賦予得行使公權力之權限，與一般公法人有行使公權力之權限而為公權力主體，因而不能主張憲法所保障人民之基本自由權利，實質上已有不同。並且從農田水利組織之歷史沿革觀察，農田水利會是由人民自組之自治團體，以群體協力及民主之方法建造、使用及維護水利設施並合理分配灌溉用水。而憲法第 14 條保障人民結社自由之真諦，在使人民藉結社之團體組

織力量得以強化及鞏固其受憲法保障之個人自由及權利。而農田水利會之組成，正是農民藉其團體組織之力量以確保其農耕工作權之行使所必須之灌溉用水，並維護及提升其農田生產力之財產價值以及藉以維生之生存權，此種團體組織權，自應受憲法第14條人民結社自由之保障。因此，如國家制定法律，將人民結社組織之農田水利會改制為行政機關而消滅此人民組織之團體者，自屬侵害人民受憲法第14條保障之結社自由。其是否合憲，即應從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予以審查，尤其「消滅」人民組織存在已久之團體，乃侵害人民結社自由之最嚴重手段，更必須審查其是否為達成水利之公益目的而不得不採取之唯一必要手段？難道其他侵害較小的手段，例如以加強公權力之監督措施，或命團體經營不善之管理機關或負責人應限期改組等措施，仍不能達成所追求之水利公益目的？才是憲法法庭真正應審酌之問題。然憲法法庭雖費盡苦心，整理歷史文獻資料，詳述農田水利組織之沿革（理由第26段至第49段），並認知農田水利會係由人民結社組織之自治團體從事水利事業者，卻無視此人民結社之歷史及事實，而以「農田水利會係依法律規定而設立之公法人，並非人民基於憲法第14條保障之結社自由所成立。從而，認為系爭規定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納入公務機關，消滅其公法人之法人格，亦不生侵害農田水利會原有會員受憲法第14條所保障之結社自由問題。」（理由第56段）乃罔顧歷史事實，偏離及迴避問題之焦點，不問其組織形成之真正因素及實質上之功能，單以其形式為「公法人」之概念立論，所做之錯誤判斷。

3. 自治團體之農田水利會因是「公法人」即不能享有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財產權？

公法人如由國家為達成特定行政目的或執行具專業性質之公共任務，撥款設置並賦予行使公權力之權限者，即為公權力主

體，而不具有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權利人適格，自亦不能主張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惟農田水利會雖為「公法人」，但並未賦予行使公權力之權限，故不能當然認為仍屬公權力主體，並因此認為亦不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且依農田水利組織之歷史演變，先有人民私建埤圳經營灌溉用水之供給，其後漸演變為灌溉用水供給需求之利益關係人合組團體組織，利用組織自治內訂之規約規範彼此灌溉用水及其相關設施使用及維護之權利義務關係。故由此演變而成之農田水利會自始即是由人民結社組織之自治團體從事水利事業者。於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雖有透過收購私有埤圳，將埤圳公共化，而不再屬於私產之行為，但當時是否已收購「全部」之私有埤圳，並無明確之論據資料佐證。從而若有私有埤圳財產並未被日本政府收購為公有財產者，其仍為人民自治團體組織所私有之埤圳財產，並非「日本官有財產」，而不屬戰後我國臺灣省政府所得接收日人財產之標的。

本件判決理由第 66 段表示：「按基於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國家固不能將原已存在之私法人，透過法律規定賦予公法人地位，即無償取得其原有之財產。但於公法人成立之始或成立之後，基於公法人地位所取得之財產，即應認係為公共利益而取得之財產，而為公有財產。」依此論述，若無明確之論據資料證明現有之 17 個農田水利會之財產均於日治時期已被日本政府「完全收購」而成為「日本官有財產」，並於戰後被我國政府接收後為「公有財產」者，則其中即有仍屬於人民所組成之水利團體所私有之財產²⁸。其後若以法律規定該水利團體負有協助防洪

²⁸ 與本件判決同日公布之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理由第 19 段指出，「根據農委會統計，農田水利設施使用他人土地共計約 6,171 公頃，其中符合

之公共任務並明定其為「公法人」，因而認為其原私有之財產即成為「公法人」之財產，並以「公法人之財產」即是「公有財產」，因而法律再規定消滅該公法人並將其「公有財產」歸由國家概括承受者，顯然已符合前揭理由第 66 段所指「將原已存在之私法人，透過法律規定賦予公法人地位，即無償取得其原有之財產」之情形，應不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然本件判決卻一再強調「1955 年水利法修正後，人民所組成之水利團體已取得公法人地位，其私有財產已轉為公法人之公有財產，此項公有財產並非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之財產，是系爭規定五及六將農田水利會所有之公有財產，明定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農田水利事業作業基金管理，繼續作為推動農田水利之經費，自不生侵害農田水利會受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之問題。」（理由第 74 段）此項結論與前述理由第 66 段所表示之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顯有矛盾。按國家為公益之目的，有徵收人民財產權之必要者，亦必須經徵收及補償程序，且經補償完畢，該私有財產始歸公有，才符合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因此，縱為公益目的，有必要將私法人之私有財產轉換為公法人之公有財產者，亦須經補償或價購，如未經補償或價購，而以法律強行移轉為國有者，即應認為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財產權。

系爭規定之無償照舊使用他人土地者，共計約 5,932 公頃，包括公有土地約 2,624 公頃、公營事業土地約 397 公頃、私有土地約 2,911 公頃。」即表示農田水利會作農田水利設施之土地，有 2,911 公頃土地為私有土地。因此，應可以反證日治時期民間團體成立公共埤圳組合法人之農田水利設施用地並非已由日本政府「全部」收購為「官有財產」而於戰後得由我國政府接收為「公有」。因此，戰後農田水利組織包括其後改組為農田水利會而作農田水利設施之土地仍存有「私有土地」之部分。換言之，農田水利會之土地並非全部已屬「公有財產」。

伍、結語

憲法訴訟法自今年 1 月 4 日開始施行至今年 9 月 30 日止共 9 個月間，憲法法庭已作出 15 件判決。相較於大官會議時代所作出之司法院解釋，73 年間總共作成 813 號解釋，平均每年僅作出 11.14 號解釋，效率顯然提升不少，幾近一倍²⁹。又 15 件判決中有 7 件宣告違憲，將近一半，顯示新制規定「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憲訴法第 30 條）已發揮相當功效，並已去除舊制時代，只要 6 位大法官之少數認為法律不違憲者，即不能作成法律違憲之解釋，而形成少數意見否決多數意見之不合理現象。此外，亦有別於舊制大法官之司法院解釋只分「主文」及「理由書」兩部分，新判決格式詳列其聲請人、案由、主文及理由。而理由欄內並分列其聲請案之相關事實、聲請人陳述之意旨，舉行言詞辯論者³⁰，並其出席人員及相關機關陳述意見之要旨。就審查之部分，並明確區分其程序及實體。程序部分說明其受理依據及受理範圍；實體部分，就其審查原則或標準，以及所涉憲法原則或憲法上之自由或權利予以闡明，最後並判斷系爭規定或裁判符合憲法或牴觸憲法；或諭示其應如何適用或修正始符合憲法之意旨，作為其判決主文之內容及依據。又判決內容之段落除附有標題外，並標示

²⁹ 憲法法庭於 9 個月間作出 15 件判決，等於平均每 3 個月作成 5 件判決。由於至年底還有 3 個月，因此可以預估全年將可達 20 件。以此件數與大法官會議時代平均每年僅作出 11.14 號解釋相比，效率提升幾近一倍。

³⁰ 15 件判決中，曾舉行言詞辯論者，有 5 件，即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111 年憲判字第 9 號判決（公務人員考績丁等免職案）、111 年憲判字第 10 號判決（警消人員獎懲累積達二次過免職案）、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農田水利會改制案）。另 1 件則於大審法施行時期曾舉行公開說明會，即 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強制道歉案〈二〉）。

「段碼」方便引用，皆為新氣象及進步之表現。

憲法法庭作成之 15 件判決，對民主憲政及人權保障之發展，皆深具影響，其實均有應注意及討論之價值。惟本文因考量演講時間，僅選擇其中有總額 1／3 大法官提出不同意見之 4 件判決，以及認為其判決之論理及判斷實有待商榷之另 2 件判決，予以分析檢討。選擇之 6 件判決中，關於「裁判憲法審查」之判決，即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改定親權事件暫時處分案），認為能把握憲法法庭為「裁判憲法審查」應有之分際，且其論證嚴謹，深具信服力。而其他 5 件判決，不論其主文宣示牴觸憲法或不違背憲法意旨，其於違憲審查之論理，則存有前後矛盾、或對人權保障未能貫徹、或論證不足之瑕疵，而有可批評之處，已如前述。本文所為之評析，固然存有學理上見仁見智之爭，然皆出於愛深責切之心，深切期望維護人權最後一道防線之憲法法庭，其判決能更見周全，並為健全法治及保障人權，做出更大之貢獻。

參考文獻

- 111 年憲判字第 02 號判決（強制道歉案〈二〉）。
- 111 年憲判字第 04 號判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之原住民身分案）。
- 111 年憲判字第 09 號判決（公務人員考績丁等免職案）。
- 111 年憲判字第 10 號判決（警消人員獎懲累積達二大過免職案）。
-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判決（健保資料庫案）。
- 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農田水利會改制案）。
- 111 年憲判字第 15 號判決（農田水利用地照舊使用案）。
- 吳信華（2022）。〈「憲法訴訟法」的幾個立法缺失〉，《月旦法學雜誌》，322 期，頁 53-70。
- 李建良（2022）。〈行政法院審判與裁判憲法審判〉，《月旦法學雜誌》，322 期，頁 6-31。
- 林鈺雄（2022）。〈裁判憲法訴訟新制〉，《月旦法學雜誌》，322 期，頁 32-52。
- 許辰舟（2021）。〈憲法訴訟法簡介及相關問題淺析〉，《司法周刊》，2084 期司法文選別冊，頁 1-32。
- 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簡抗字第 13 號民事裁定。
- 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家暫字第 46 號民事裁定。
- 臺北地方法院 108 年度家聲抗字第 122 號民事裁定。

